

钟敬文先生对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贡献

万建中

一、研究民俗学的人类学情结

早在60年前,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弗思(Raymond Firth)发表了《人文类型》一书,此书开宗明义:“作为一位人类学者,我将注重那些生活方式和西方文明不同的人民的习惯和风俗。我注重他们并不只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在猎奇者看来比较新奇,也不只是因为这种知识对于在不发达国家工作的人大有裨益,而是因为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进行研究能帮助我们明白自己的习惯和风俗。”^①

人类学研究的许多内容,实际上与民俗学是重合的,国外的人类学家有些同样也是民俗学家。民俗实际上不只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一种民众行为、民众的观念、民众的组织形式、民众对生活的看法、民众的知识,民俗学与人类学交叉重叠的地方就在这里。对此,钟敬文先生有明确的表述:“人类学(这里主要指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姊妹学科,它们所处理的文化对象,主要是人类集体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它与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所处理的对象大部分是共同的或密切相联的。因此,在资料的收

^① 弗思《人文类型》,中文版,费孝通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集、整理和理论的探索、阐发等方面,都有互相汇通和互相借鉴、启发等作用。作为一种应用科学,彼此在学理上往往也是相通的。”^①人类学与民俗学之所以有一种亲缘关系,两门学科研究对象有交叉,这个交叉的本身就规定了两个学科间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人类学调查和探讨人们的行为表现、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生活状态,其研究方法都可以为民俗学所运用,实际上,民俗学的研究是受到了人类学的影响。我们现在之所以把人类学和民俗学联系起来,来探讨它们的亲缘关系,就是从中国现在的研究现状看,有很多人的研究是跨学科的,而且,现在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很多为民俗学所采用。人类学原来运用的方法、研究对象,有些恰恰是民俗学所忽视掉的,现在借用了人类学的方法,正好可以弥补民俗学研究中原有的不足与空缺。

许多研究方法,两个学科都是共同的,比如说结构主义人类学方法、象征人类学方法以及解释人类学方法等等。按照某些美国人类学者的分类,民俗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学科分支,或者说可以说彼此是姊妹学科。人类学和民俗学从其研究对象来说有一种交叉的关系。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的活动的,人的存在环境,人的行为方式,人类所创造和享用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民俗学实际上也是如此。过去似乎有一种误解,认为民俗学研究的是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是民间文化现象,实际上所研究的这种现象本身也是以人为主体的,是特定众的一种群体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生活状态。在研究对象上人类学和民俗学是有

^① 钟敬文《给〈西方人类学史〉编著者的信(代序)》,《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468页。

很多相通之处的,包括研究方法,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方法——田野作业,这一研究方法是相通的。文化人类学强调理解,理解当地人对自己生活现象的看法,民俗学的立足点也在这一点上,这也是相通的。所以钟敬文先生指导的一些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村落社会组织建构、村落族群的社会关系,现在出版的一些关于某一区域人们生活状况的调查与研究的专著,也是民俗学者写的。研究某一村落的文化现象,村落史的研究,村落各类组织的研究,实际上都是民俗学家来做的,他们运用的也主要是人类学的方法。我们不能把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只是停止在揭示文化遗留物的层面。当然这也是一种研究。现在我们民俗学研究领域也不只是局限在一些边远的、落后的山区,它也在研究城市社区,研究社区人们的生活创造和文化创造。研究这些民俗,若不借用人类学的方法是很难进行的。

二、钟敬文先生的人类学实践

钟敬文先生之所以名望这样高,不只是局限在民俗学这一领域,钟先生的学科背景是国学的学科背景。你到钟先生家里看,他那些堆积如山的书籍不只是民俗学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书都有,很前沿的书籍他都有,他之所以要求他的弟子们在知识结构上要健全、合理,是从他自己研究的经验得出了对弟子的这种要求。

他自己在20世纪20年代就接触了英国人类学和法国社会学的理论,像不久前翻译出版的迪尔凯姆的《宗教生活的原始形态》一书,在半个多世纪前钟先生就已阅读了,其他陆续阅读的

还有马雷特的《人类学》、拉罗的《艺术与社会》、莫尼尔的《社会学与经济学》、功能学派马琳诺夫斯基、布朗等的《未开化社会的性生活》、《科学的文化理论》、《原始社会的结构与机能》,美国历史批评派学者波亚斯、威斯勒、罗维等的《人类学与现代生活》、《人类与文化》、《原始社会》以及葛兰言等汉学家的名著。据钟先生回忆,五四运动开始那一年,他还特意邮购了北京大学陈映璜教授的《人类学》,他的老师西村真次教授的《人类学泛论》对他影响也很大。钟先生后来深有感触地说:这些人类学方面的专著,“实在开拓了我的学术视野,对我的专业探索也给予了一定的启发、协助。现在我对民间文艺和民俗的观察能够看得远些,有时还能对它体会得深些,除了其他原因外,这种补助学科的知识无疑是一种有力帮手。”^①

钟敬文先生的论著,就是多种学科方法综合运用的典范。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撰写的一系列民间故事方面的经典性论文,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就极为娴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论文仍闪烁着耀眼的学术光辉。其中大部分的论点、论据和论证至今也没有被超越,诸如《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中国的地方传说》、《老獭稚型传说的发生地》、《中国的水灾传说》、《蛇郎故事试探》等等,倘若现在投稿发表,仍旧是处于学术前沿地位的。刘守华教授是这样评价钟先生借助人类学方法的研究成果:“中国民间文艺学主要代表人物钟敬文,也深受人类学派的影响,但他后来已吸取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学派的理论和

^① 钟敬文《给〈西方人类学史〉编著者的信(代序)》,《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468页。

方法作了一定程度的改造,从而在中国民间故事的研究上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①

三、民俗学对人类学的影响

由于中国特殊的时代环境,新中国成立以后,人类学曾一度被列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被打倒、被禁止研究了,而民俗学(尤其是民间文艺学)因为是民间的东西,在钟敬文先生等人的努力倡导下,却没有被禁止。民俗学和民族学一样一直得到发展。从学科发展史上来讲,钟先生始终在坚持民俗学的研究,现代民俗学和人类学研究实际上一直没有中断。民俗学研究的不中断性对人类学研究延续性的影响就像对宗教学的影响一样,当时宗教学也是不能提倡的,而民间文学、民俗学则一直在不间断地研究,实际上起了一个很好的带动作用。我国的人类学、民俗学之所以能在今天得到飞速的发展,没有中断研究,有一个长期研究的积淀是关键的原因。现在中国人类学研究与国际上接轨得这样密切,与那段时间的积淀息息相关。

民俗学的独立与民族学的独立一样,考古学也是从人类学中独立出来的,因为中国的特定环境造成了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的迅速发展。若从这个角度讲,民族学、考古学、民俗学都可以说是一级学科。这些学科在人类学不能发展的情况下它们发展起来了,这些学科的发展为人类学的复苏作了必要的铺垫。人类学的方法也在某种程度上指导着这种发展。

^① 刘守华《比较故事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